

波音 著

草與禾

中華文明
4000年融合史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錄

序 中華文明的視角 / I

第一章 雙峰對峙——草的世界與禾的世界

從「滿天星斗」到「月明星稀」 / 002

商周天下：中國與四方 / 021

迷霧中的北境 / 037

白登山前後：兩個世界的戰與和 / 052

從馬邑之謀到燕然勒石 / 073

第二章 胡漢難分——以華夏為主體的混合政權模式

誰來興復漢室 / 098

走向洛陽城 / 119

飛旋在亞洲舞台 / 142

大唐變成小唐 / 161

第三章 北馳南渡——以草原為主體的混合政權模式

契丹人的「新農村建設」 / 179

女真人南柯一夢 / 205

轉進江南：水運即國運 / 226

第四章	萬里一統——元朝統一政權模式
	成吉思汗：重塑草原的遊牧人 / 248
	大元王朝的三大支柱 / 267
	朱棣：披着大明外衣的「蒙古人」 / 294

第五章	天下一家——清朝統一政權模式
	朝貢、援朝與白銀資本衝擊 / 308
	皇太極：「我是誰？」 / 330
	草原的最後輓歌 / 343
	天下的清朝 / 359

後記	春草秋禾織天下 / 371
-----------	----------------------

序

中華文明的視角

透視中華文明數千年的融合過程，其中最主要的推動力是草原文明與華夏文明之間的互動。

「夏商周秦漢，唐宋元明清」，長期以來，我們的教科書以及史書通常以華夏王朝的更迭為主線，來展現中華文明的面貌。然而，要想真正了解並理解中華文明的來龍去脈，僅僅觀察華夏的文明進程，僅僅以華夏的視角觀察中華文明，是片面的。

原因在於，史書大多是華夏文人書寫的，他們往往站在華夏的視角看待華夏、看待草原。而草原世界早期沒有發明文字，即便後來有了文字，其文獻的生產量也遠遠不能與華夏相比。草原和草原族群隱藏在歷史的迷霧之中。

而且，史書中展現出來的不同區域的文明面貌，對華夏來說出自一種自我觀察的視角，而對草原來說，出自一種旁觀者的視角。不足為奇，史書中的華夏更多地被描述為文明的高地，即使華夏被外來勢力征服後，史書的書寫者也試圖

通過對「正統」的重新解釋，把成功入主的外來統治階層納入自己構建的文明體系之中。

而從旁觀者的視角看，草原往往被描述為蠻荒之地，遊牧民族經常被賦予「野蠻人」和「掠奪者」的形象。遊牧民族對於自身的認識、他們在面對華夏時的策略、他們對華夏的看法，由於視角的問題，被史書長期忽視、誤讀甚至歪曲了。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要俯視中華文明的全貌，就要跳出「廬山」觀察。

本書試圖更為全面地反映中華文明漫長的融合歷史，儘量客觀地描述中華文明如何從 4000 多年前星星點點的史前文化據點開端，經過漫長的融合過程，逐漸擴大到元明清時代的規模；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不同生產環境裡的人們在歷史長河中如何接觸、互動、交流，共同譜寫了文明融合的篇章。

本書所說的「草的世界」（草原文明）是較為廣義的概念，包含了北方蒙古草原及其兩側的東北地區和西北地區，或者粗略地說，是長城之外的區域。本書所說的「禾的世界」（華夏文明）同樣不止包含了狹義的平原農耕區，而是指長城之內，以農耕平原為主幹，囊括了山川河湖的區域。

以清朝鼎盛時期的版圖看，北方草原帶加上東北地區、西北地區，其面積已經超過了「禾的世界」的面積，如果前者加上青藏高原，二者之間的差距就更大了。雖然在人口和物產上，農耕的「禾的世界」一直擁有明顯的優勢，但是草原的

優勢在於以騎兵為主的強大軍事力量，這足以使草原與華夏成為對等的兩大區域文明，忽視任何一方區域文明的影響力和歷史貢獻，都無法清晰解釋中華文明的發展脈絡。

於是，本書探討的核心主題是，相隔萬里的古人們何以超越了不同的自然環境的差異，彌合了「草的世界」與「禾的世界」在政治體制、經濟模式、文化傳統方面的巨大隔閡，最終形成了大一統的國家。

要明晰這個主題，就不能只從華夏視角觀察，或只從草原視角觀察，而應該是多視角的。

本書並不是要否定華夏的視角，華夏文明數千年來的輝煌燦爛，已經無須贅言。廣闊平原上的農耕經濟哺育了眾多人口，這一區域的文明早已公認為全球主要的古代文明之一。本書也不是完全從草原的角度來重新書寫中華歷史，因為從任何單一區域文明的角度來解讀古代中國，都只是對作為整體的中華文明的管中窺豹、盲人摸象。本書嘗試以更為廣闊的視野，從多個視角來觀察華夏與草原的歷史演進，探查不同區域文明的歷史細節，展現各區域文明之間生動的融合過程，特別是對中國歷史走向影響巨大的草原文明與華夏文明之間長達數千年的碰撞、互動、融合過程。

本書大體上以 4000 多年來的中華文明的演變為主線，從「滿天星斗」的史前文化時代一路走過商周秦漢、三國兩晉、唐宋元明清，也一路走過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回鶻契丹、女真蒙古，走到大一統的清朝，及受到全球化強烈衝擊

的清末民初時期。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偏向草原文明的視角，主要強調了不同文明如何協調自身，如何呼應對方，如何選擇文明的發展方向。

在寫作過程中，筆者有着超越自己學識水平的貪天之念，意欲對中華文明融合過程進行一次整體上的簡要梳理，不僅從各種區域文明的視角出發，還從多學科的視角出發，因此必然錯誤多多。希望讀者能夠原諒筆者的學識短淺，理解筆者所強調的多視角解析文明融合的殷殷之意圖。

本書文字上力求通俗有趣，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深入淺出地講解中華歷史與中華文明，既有豐富的故事性，也有一定的思想性。希望本書對於讀者了解中華文明的來龍去脈能夠有所幫助。

感謝在此書從醞釀到出版的過程中提供幫助的所有人，感謝我的家人，感謝創造了輝煌中華文明的祖先們。

波音

於汗八里 / 北京

第一章

雙峰對峙

——草的世界與禾的世界

從「滿天星斗」到「月明星稀」

在那久遠的上古時代，大陸是廣闊的，人煙是稀少的。最早湧現的那批人類文明，就像是宇宙中的繁星一般，散落在凡間廣袤的大陸上，彼此相距遙遠，交通不便。

當時的人類以狩獵和採集為生，每個族群的人不多。即使到了距今 1 萬年前左右，也就是農業出現之後，在很漫長的一段時間裡，人類仍然耕種、狩獵和採集並重，因為早期的農作物產量很低，整個族群靠單一的生產方式是無法存活的。

隨着人口數量緩慢增加，大陸上終於出現了一些光彩奪目的早期文化。如果我們穿越回四五千年前的中華大地，會遇到許多繁榮而有趣的文明。

比如在今東北地區南部的遼河流域，有小河沿文化，它可能是承襲了更古老且神秘的紅山文化。後人在紅山文化遺址發現了祭壇、女神廟和積石塚，還出土了各種精美玉器，其中的玉豬龍被很多人看作中華文明最早的龍的形象。

再比如分佈在黃河中下游區域的龍山文化，那裡古人可以製造出輕薄而堅硬的黑陶。更有位於黃河北部山西

臨汾盆地的陶寺文化，那裡擁有規模巨大的城市，人口密集，匯聚了周圍各種文化的精華，人們甚至猜測陶寺遺址可能是傳說中的「堯都」。

把目光轉向南方，輝煌的良渚文化一定會令你驚歎。良渚文化分佈在長江下游至錢塘江流域，其中位於太湖流域、總面積約 300 萬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有着水利系統、宮殿、祭壇以及鮮明的城鄉體系。在良渚古城中，市民住在類似城牆的環形區域之上，貴族則居住在人工堆砌的土台上，而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則居住在古城之外的多個村落中，形成了鮮明的城鄉分割。在良渚古城中發現的玉管、玉珠、玉料以及一些製玉工具證實，良渚古城內的居民已經不是農民，而是手工業者。手工業者製作的玉器、漆器、精緻的陶器、象牙器以及絲綢集中出土於高階層人物的墓葬中。良渚遺址的大型墓葬群及裡面的精美玉器、土築高台和祭壇令人歎為觀止。

考古學家把這個時期的中華文明狀況稱為「滿天星斗」。

在那個時代，各種絢爛的文化星羅棋佈地分佈在中華大地，它們之間已經不像是 1 萬多年前地球冰期剛剛結束時那樣老死不相往來，而是互相之間有了交流。人們會彼此交換陶器、青銅器、玉器等珍貴物品，把自己的文化傳輸到遙遠的地方。

似乎假以時日，各個地區文化再繼續各自發展，人口不

斷增加，它們也許真的會逐漸融合，形成一個完整的、統一的中華古文明？

接下來竟風雲突變，打碎了人們的美好幻想。

在距今4 000—3 500年，從北到南，從東到西，中華大地上的許多古文化突然間消失了。

先讓我們順着長江逆流而上考察一下當時的古文化消失事件。良渚文化於距今5 300年前興起，在距今4 000多年前衰落了。與良渚文化的衰落時間類似，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的興盛期為距今4 600—4 000年，長江中上游成都平原上的寶墩文化的興盛期為距今4 500—4 000年，都在距今約4 000年前衰落了。

接下來，讓我們離開長江流域，去看看北方的情況。黃河上游曾經有個齊家文化，畜牧業非常發達，飼養的家畜有豬、羊、狗、牛、馬等，尤其是養豬業最為興旺。齊家文化在製陶、紡織及冶銅業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可惜，發達的齊家文化在距今約3 700年前走向消亡。

此外，更北方的遼河流域的小河沿文化在距今3 500多年前也走向了衰亡。

不約而同地，在這個時期，大量的中華古文化都走向了衰落，古文化的群星變得暗淡了。

就在各古文化走向衰亡的時候，有一處的文化不僅沒有衰亡，反而越來越繁榮，這就是以河南為核心的中原地區

文化，其代表就是二里頭文化。

二里頭文化的興盛年代約在公元前 1750—前 1530 年，從時間範圍看屬於傳說中的夏朝中晚期，二里頭文化的分佈範圍幾乎覆蓋了整個黃河中游地區。其中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曾是一座經過縝密規劃、佈局的大型城市，在那裡還發現了大型綠松石龍形器的隨葬品，這說明在那時，龍作為圖騰形象已經開始確立了。

部分學者認為二里頭是夏朝的都城遺址，但是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為這裡的考古發現與商朝的許多特點有關聯，可能屬於商朝建立之前早期商人的城市，並不是傳說中的夏朝的都城或城市。

如果說中華文明曾經在 4 000 多年前有過「滿天星斗」的景象的話，那麼接下來的距今 3 000 多年前的階段，則是「月明星稀」：華夏文化是一輪耀目的月亮，照亮了當時的文明夜空，而周圍的文化相對於華夏，則是光亮較弱的星星，它們中的大部分甚至還達不到數百年前當地文化的發達程度。

這就是早期中華文明的「月明星稀」之謎。衰落的那些文化繁星到底遭受了怎樣的變故？

為了解釋「月明星稀」之謎，考古學家試圖還原那個時期的社會面貌。他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那些走向衰落的南北古文化，衰落前都從相對定居和農耕的生活狀態，

變成了自由遷徙的生活狀態。

原本良渚文化獲取肉食主要靠飼養家畜，漁獵活動只是輔助，可是良渚文化衰落之後，當地的一些後起文化反而主要以漁獵的方式獲得肉食，家畜飼養變少了。我們知道，家畜飼養代表了定居的文化，漁獵則代表要經常遷徙。

位於黃河上游的齊家文化也有這樣的趨勢。齊家文化時，養豬業比較發達，養豬代表餘糧充足和定居的生活方式，可是後來出現的文化反而不怎麼養豬，他們的陶器也比之前的齊家文化小。所以，後來者更容易遷移。

與此同時，遼河流域的古人也放棄了他們的農業聚落，很可能轉為遊牧生活了。

大量古文化都從定居轉向自由遷移，說明在距今約4 000年前，中華大地上出現了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動盪。一般來說，出現這種現象，往往意味着一種外來文明或外來民族突然闖入，引發了許多部落的遷移，涉及廣闊的地域。

「月明星稀」現象也許是外來民族帶來的大動盪造成的？

外來文明入侵導致遷徙的事例的確古已有之，然而我們現在討論的是約4 000年前的東亞一片廣闊的土地，至少包括了遼河流域、黃河流域、淮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真的會有一個古老文明在較短的時間裡席捲了如此廣袤的東亞大地嗎？

不太可能。

而且，外來文明侵略往往會帶來本地文化的劇烈變化，會有大量新的文化元素侵入，可是考古學家目前在各地遺址中並未發現文化上有翻天覆地的變化。

真正能夠在廣袤的大地上「興風作浪」的因素，可能並不是外來文明，而是氣候。只有氣候變遷能夠影響如此廣闊範圍內的人類和文化。

然而當考古學家考察古文化衰落時期的氣候時，卻得到了各種不同的氣候變化趨勢。比如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在距今約 4 000 年前走向崩潰，看上去與海平面上升帶來的持續洪水有關。那個時期，太湖的水域和森林、草地面積明顯擴大了，這說明當地氣候變暖，降雨量加大，帶來了植被的繁盛和水域的擴大，甚至洪水滔天。

但是對於遼河流域的夏家店文化，看上去卻是由於氣候變冷導致了古文化衰落。原本遼河流域及其周邊分佈着許多農業聚落，有石頭圍起的許多建築。可是到了距今 4 000 年左右，這些農業聚落逐漸被遺棄，當地人類活動也日趨減少，這從當時留下的遺跡變少就可看出來。對這種農牧交界區域來說，氣候變暖會帶來當地農業聚落的繁榮，氣候變冷才會讓農業聚落蕭條下去，這裡古文化的衰落顯然有氣候變冷因素的影響。

如果約 4 000 年前氣候確實發生了明顯變化，那到底是

變暖了，還是變冷了？

此外，用氣候變遷來解釋「月明星稀」現象，還必須回答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為甚麼二里頭文化，不僅沒有受到這次廣泛的氣候變遷的打擊，反而不斷走向繁榮呢？

那個時代的古人甚至還沒有發明文字，或者最多只有文字符號的雛形，因此不可能留下當時的氣象記錄。沒有古代文獻，要了解約4 000年前的氣候變遷，我們只能藉助今天的科學技術了。

科學家發現，一些古老湖泊底部沉積了上萬年的泥炭層，每個時期的大氣降水都會對當時形成的泥炭層中的碳同位素產生影響。所以，通過研究湖泊泥炭層中碳同位素的變化，就可以推測出歷史上不同時期的降水量。降水量和氣溫是氣候的兩大重要指標，同時降水量的變化和氣溫也有一定的關聯性。

科學家還知道，影響中國東部降水量的主要氣象因素，是我們經常在天氣預報中聽到的一個詞語——副熱帶高壓。

副熱帶高壓是地球大氣環流的一個重要系統，一般位於地球南北緯30度附近的副熱帶大洋上空，它對附近區域的水汽、熱量的輸送和平衡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靠近亞洲大陸，對中國東部、朝鮮半島和日本等東亞地區氣候有着重要作用。

不誇張地說，中國東部的氣溫、降水的變化，主要受西

太平洋副熱帶高壓的控制，它也對中國的漫長歷史產生了隱秘且至關重要的影響。

具體說來，當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位於偏北方的位置時，北方地區降雨會比正常年份多，而南方地區降雨會比正常年份少；反之，當它處於偏南方的位置時，降雨的情況就是北少南多。所以，我們可以形象地把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稱為「東亞雨神」：它偏向某個方向，鄰近的大陸就會有更多降水。

科學家根據泥炭中碳同位素數據分析，在距今約 4 800—4 200 年，也就是中華文明「滿天星斗」的時期，「東亞雨神」長期位於偏北方的位置，這一時期，中國的東北地區、華北地區和黃河流域的夏季可能持續多雨，並可能出現洪澇災害。長江流域的夏季降雨則可能持續偏少，出現相對乾旱。這樣的降雨分佈對中華大地上的早期文明來說，可謂福禍不同。

對東北地區乃至延伸到今內蒙古地區來說，本來正常年份降雨是較少的，降雨增加利於農作物生長和產量提高，對當時的文明來說是好事。而對長江流域來說，本來正常年份降雨是較多的，這個時期降雨有所減少，略微乾旱的氣候有利於河網密佈、沼澤泥濘的長江流域泥土乾化，出現更多適合耕種的土地，對那裡的文明來說，也是好年景。

相對來說，這個時期黃河流域的人們就較為苦惱了，他

們相對靠近北方的緯度位置，加上有一條大河水系在該區域流過，所以降雨增多帶來了較多的洪澇災害，給文明的發展帶來了不少麻煩。

以上就是4 000多年前古文明「滿天星斗」時的氣候分析。簡單地說，就是當時的降雨量分佈有利於南方和北方文明的生存和發展，對中原文明略不利。

天有不測風雲，根據湖底泥炭層分析，距今約4 200年前，東亞大氣環流出現了一次重大的調整。「東亞雨神」結束了自己長達約600年的「北居生活」，開始向南移動，轉為「南居生活」。請注意，在接下來的約1 600年裡，也就是距今約4 200—2 600年，它都將位於偏南方的位置。這段時期大概相當於傳說中的夏朝到春秋時期。

於是，在距今4 000年左右的時候，中國東部大陸上的氣候，特別是降雨分佈發生了重大改變。東北、華北地區和黃河流域由長期降雨偏多轉向降雨偏少，而長江流域則降雨偏多起來。

可以想見，東北地區的人們發現生活變得艱難了，降雨減少給他們的旱地農業帶來了沉重打擊，讓他們原始的農耕文明慢慢衰落下去，一部分人被迫向南遷徙，留下的人可能轉向了狩獵、採集和遊牧生活。而長江流域的人們也發現日子不好過了，降雨太多讓他們的家園變成了一片澤國，適合耕種的田地變少，他們以水稻種植為基礎的農業遭受

了沉重打擊，他們不得不離開家園，去別的地方謀生。

風水輪流轉，此時黃河流域的人們興高采烈起來，肆虐當地的洪澇災害過去了，降雨量也比較適中，利於農業的開展。於是在北方和南方的諸多文明相繼遭受重創、逐漸暗淡的時候，黃河流域的文明如同一輪圓月，在中華大地上冉冉升空，文明的光芒照耀着大地。

這就是中國東部地區早期文明從「滿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的劇情，這個劇情的主角是氣候變遷，是「東亞雨神」的南北移動。

這個劇情版本和真實的人類文明劇情是一致的嗎？只能說，用氣候變遷來解釋「月明星稀」比起外來文明入侵，更有科學依據一些，更靠譜一些。而且我們要知道，越是遠古時代，古人的科技水平越低，對抗環境變遷的能力越低，因此古文明受自然環境的制約就越大。在距今約 4 000 年前的時代，氣候變化對古文明的影響，很可能會是決定性的。

不管怎樣，在四周古文明相繼暗淡的時候，華夏文明的一輪明月升起了。下面，就讓我們欣賞一下這輪明月的文化景色。

初升的太陽照向了伊洛河，河水泛起亮色，河北岸的高地也沐浴在清晨的陽光中。這塊高地就是二里頭，我們正穿越回 3 500 多年前。

二里頭是位於今河南的伊洛河北岸沖積平原最南端的

一塊高地，四周則是平坦、肥沃的氾濫平原。如果視野放廣一點，我們會發現二里頭及其周圍地區坐落在群山環繞的一塊盆地中，盆地的北面是連綿起伏的邙山，南面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嶽嵩山。

這是一片安居樂業的土地，但二里頭的居民可能並不知道，就在幾百年前，這裡曾經爆發了洶湧的洪水。洪水並不是二里頭局部的現象，在整個黃河中游及其支流，甚至淮河上游都洪水滔滔。我們有理由認為可怕的洪水與「東亞雨神」有關。

這次大洪水事件給當時的仰韶—龍山文化時期的先民以沉重的打擊，卻也改變了二里頭地區的地貌和水文，劫後餘生之後，這裡變得更適合人類生存，沖積平原土質肥沃，有利於早期農業的開展。

二里頭居民種植的農作物中，最多的仍然是土生土長的粟和黍，也就是小米和黃米。但早期居民在農作物品種上是多多益善的，也種植大豆和小麥。大豆在當地的農業生產中始終佔有一席之地，種植規模和比例雖然不突出，但相對穩定。這裡的居民並不知道，他們當時種植的小麥其實來自遙遠的西方，起源於西亞。到了二里頭時期，小麥已經變成了中華文明一種重要的農作物。

東亞的二里頭種上了原產西亞的小麥，說明遠古時期亞洲大陸東西方就已經存在了交流。

有趣的是，二里頭還種植水稻這一原產於南方的農作物。這是因為當時二里頭地區的氣候並不像今天的河南這樣乾旱。3 500 年前，這裡的人們生活在較為暖濕的亞熱帶北緣自然環境下，氣溫比今天高，降水也比今天豐沛。據估計，當時二里頭的年平均氣溫約為 16 攝氏度，年降水量在 1 000 毫米左右。如此暖濕的氣候讓二里頭的平原上分佈了相當多的積水窪地，這些地方不適合種植耐旱的粟、黍、麥等，卻是種植水稻的理想水田環境。因此在二里頭時期，這裡水稻的種植面積比此前有所擴大。

粟、黍、麥、豆、稻，古代中國所謂的「五穀」在二里頭全都齊了，可以想像二里頭秋收的時刻，真可謂五穀豐登。

早期先民的生活當然不會那麼愜意，當時各種農作物的畝產量是很低的，為了填飽肚子，他們必須想盡辦法獲得更多的食物。

二里頭文化時期，人們的肉食已經不再主要依靠狩獵，家養的牲畜已經能夠提供大量的肉食。比如說家豬，早在二里頭文化之前 3 000 年，野豬就已經在中華大地上經過馴化變成了家豬，但在二里頭文化時期，由於農業的發展，先民們有了更多的剩餘糧食和殘羹冷炙給豬食用，因此家豬的養殖變得很興旺。

總之，二里頭先民的肉食菜譜十分豐富。貝類、魚類、

爬行類、鳥類，只要能獲得的肉食，他們來者不拒，當然最主要的食物來源還是哺乳動物，特別是豬、牛、羊這幾種家畜，以及野生的梅花鹿。

有了充足的食物，早期文化的繁榮就有了底氣。佔據天時與地利的二里頭文化不愧是中華文明早期文化中的一輪明月。

一座巨大的夯土「城市」傲立在二里頭高地上，俯視着周圍的平原和河流。這是一座井然有序的大型建築群，有着縱橫交錯的大道、方正規矩的宮城，宮城內還排列着多座建築，具有明顯的中軸線格局。

二里頭的道路十分寬闊，外圍大路最寬處超過了 20 米，主要建築之間也有通道相連或相隔，比如考古學家發現，在東西並排的兩座大型建築基址之間，就有寬約 3 米、長達百米的通道相隔。通道的路面下，還有木結構的排水暗渠。其中一處基址是一座多進院落的組合式建築，它的南院和中院有多座東西並排的墓葬，而北院發現了有積水跡象的大型池塘遺跡，當年這裡也許是一片美麗的宮廷池塘，蛙鳴魚躍蜻蜓飛。

當時的二里頭社會已經是一個階層井然的社會，在宮城周圍特別是宮殿區以東區域，居住着二里頭的貴族們。從出土的一些較精美的玉器和陶器，後人可以推斷出他們身份高貴。而在這座「城市」的西部和北部，則是一些小型

的地面式或半地穴式建築，在小型墓葬中出土的一些陶器，說明這個區域是二里頭一般先民的生活區。

二里頭先民不僅忙碌地在田地勞作，在叢林狩獵，他們也在「城市」裡辛苦工作着。從宮殿區向南 200 餘米的位置，就是他們的一處重要的工作場所——鑄銅作坊，面積竟然達上萬平方米左右。二里頭遺址的青銅作坊規模大，延續使用時間長，包括了澆鑄工場、烘烤陶範的陶窯，展現出當時的鑄銅工藝設施已經有較高的專門化水平。這其實並不奇怪，二里頭時期屬於青銅時代，銅器在那個科技不發達的時代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二里頭又不僅僅是一處「城市」，它實際上類似於首都，統治力向外輻射，控制着四周廣闊區域，因此二里頭有需求也有能力長期維持規模很大的鑄銅作坊。

而在宮殿區和鑄銅作坊之間，還另有一處作坊，這是綠松石器製作作坊，二里頭先民主要在這裡製作綠松石管、珠及嵌片之類的裝飾品。

鑄銅作坊和綠松石作坊應該都有圍牆包圍着，說明當時對這些重要生產部門的管理較為嚴格，很可能是由統治階層直接控制和管理生產。

然而，二里頭自身並沒有銅礦和綠松石礦。在鑄銅作坊裡，如今所見都是熔煉渣，說明這裡只負責進行青銅的熔煉和鑄造工序，而開採礦料和冶煉礦料是在其他地方完成

的。至於綠松石礦，可能來自向南幾百公里（千米）之外的山區，那裡有綠松石礦的礦帶。礦石來自遠方，也佐證了二里頭作為都邑的控制力是很強大的。

對神靈的崇拜，是科學不昌明的遠古時代的普遍現象，二里頭先民也不例外。在「城市」的中東部，也就是宮殿區的北方和西北方一帶，集中分佈着一些與宗教祭祀活動有關的建築和其他遺跡，主要包括一些圓形的地面建築、長方形的半地穴建築，以及附屬於這些建築的墓葬。二里頭先民可能就是在這些祭祀點，祭拜先祖和神靈。或許他們在參加儀式的時候，會帶上精美的綠松石裝飾品和光亮的青銅器物，祈禱神靈保佑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風調雨順，人丁興旺。

從二里頭文化的輻射範圍看，它已不限於與鄰近地域的鬆散交流，而是大範圍地向外擴散。例如，作為二里頭文化重要禮器的盃、爵等，在二里頭文化的興盛期，已經到達了距中原相當遠的地域：向北發現於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向南發現於今四川到今浙江的長江流域一帶，向西擴散到黃河上游的今甘肅、今青海一帶。

更有意義的現象是，從出土位置上看，二里頭傳播出去的這些陶器、青銅器，並不是距離二里頭越近，出土就越多，這些禮器往往出土在二里頭文化擴散的遠方，尤其是與其他古文化的交界處附近。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一種擴散現象呢？

這是因為，禮器和普通日用陶器的擴散方式是不一樣的，禮器的作用是連接了二里頭文化涉及的各個地方的中心據點，它們的傳播其實是在不同區域的社會上層之間進行的。換句話說，二里頭文化在當時已經與南北方廣闊區域的族群有着頻繁的聯繫，而且對各地的族群有着重大影響力。

這樣的擴散現象揭示出當時的二里頭政權的一種策略、一種觀念。二里頭文化應該不可能有非常強大的軍事力量，去遠距離征服從燕山南北到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就像我們不認為有外來文明依靠武力製造了「月明星稀」的文化景象一樣。但二里頭政權顯然並不滿足於自己這「一畝三分地」的統治區域，而是想在更廣闊的天地中擁有影響力。

如何才能把自己的影響力輻射到廣闊區域？那就是——文化輸出。

二里頭政權的確利用自己的文化輸出，用原始的禮器和禮制，在文化層面上，在廣大地區實現了初步的文化融合。正是看到二里頭文化時期廣大地區在文化上的融合現象，有些考古學家指出，我們可以把這個時期看作「最早的中國」。此中國並非是疆土的統一體，而是在文化上的趨向統一。

換句話說，在以中原為核心向外輻射的廣大區域中，文明的融合首先是從文化上開啟的，而不是武力先行。

二里頭文化是一種以農耕為主要特徵的文化。農耕生產方式是古代先民一種極為重要的謀生手段，本書將把以農耕生產方式為主要謀生手段的地區稱作「禾的世界」。在秦漢時代形成了長城以南的廣大政權後，我們可以整體上將這片區域稱為「華夏」，從整體上看，華夏是以農耕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地域，屬於禾的世界。

距今3500多年前，北至燕山山脈，南達長江流域，西到今甘肅、青海，東臨大海，以中原為核心的「禾的世界」在文化層面上的融合已悄然開啟。中華文明融合的重要劇目開演了。

歷史貼士

商朝人沒聽說過夏朝

對夏朝，中國人有特殊的感情，因為根據歷史傳說，夏朝是中國的第一個朝代，是大禹的兒子啟建立的世襲制國家。根據史書推斷，如果夏朝真的存在，它的時限在公元前21—前16世紀，可能是多個部落聯盟組成的較為鬆散的國家。

但對考古學家來說，一提起夏朝，卻令人傷心。在中國古代史書中被尊為上古第一朝代的夏朝，竟然找不到支持其存在的現實證據。

首先是沒有找到夏朝人的文字記錄。其次是有關夏朝

的各種文獻資料的形成年代，基本都比傳說中的夏朝晚了好幾百年，特別是系統記載夏朝歷史的司馬遷的《史記·夏本紀》，寫作時間更是比傳說中的夏朝滅亡的時間都晚了約1500年。

按照歷史研究的一般規則，當時的人敘述當時的事，稱為第一手史料，價值是最高的。如果後期的記載與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相距過於久遠，記載的可信度就大大降低了。

更讓人生疑的是，史書上都記載商朝推翻了夏朝，取而代之。那麼，商朝人留下了大量的甲骨文記錄，這些甲骨文充分證明了商朝是真實存在的。可是，關於改朝換代、光宗耀祖的「推翻夏朝」的重大事件，甲骨文裡竟然沒有一處提及。更詭異的是，商朝人的甲骨文裡連「夏」這個國名或者族群的名字都沒有。

雖然商朝人在甲骨文裡根本沒寫夏朝如何如何，但是對商朝建立前的那段歲月還是有記述的，而且特別讚頌了他們的先祖多麼多麼偉大。這其中就記載有一個叫王亥的商族人首領，甲骨文裡尊稱他為「高祖」。在司馬遷的《史記》裡，也提到了商族人的先祖王亥這個人。

更有趣的是，在一本叫作《竹書紀年》的古書中也記錄了王亥，而且講述了一個故事：王亥趕着牲口去做生意，結果被人殺死，他的兒子甲微，也是商族人的先祖之一，向河伯借兵，為自己的父親報仇雪恨。

《竹書紀年》發現於戰國時期魏國君主的墓地，所以躲過了秦始皇征服六國後焚書坑儒的浩劫。這本書的一些記載與《史記》等著作有出入，但是甲骨文發現後，學者們發現《竹書紀年》對商朝國君的次序、名字的記錄比《史記》更符合甲骨文記錄，因此這本古書的史料價值很高。

如此看來，在湯建立商朝之前，商族人就已經有了一定的文明，而且後人還把一些事跡記錄了下來。商朝之前，應該還有許多部落和商族人一起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當時的文明程度是很高的，出現一些強大的「方國」也是有可能的。

那麼，其中是否有一個非常強大，統治了很大範圍的夏方國存在呢？

從商朝甲骨文的記載看，商朝人並沒有用「夏」來指代當時任何一個方國，當時的人也沒有所謂的朝代的概念，在他們的觀念裡，天下是由許多類似於本國的方國組成的，只是有的強大一點，有的弱一點。商朝人似乎完全不知道有個夏朝存在，但這不代表夏朝就一定不存在。

為排定中國夏商周時期的確切年代，國家於1996年5月16日啟動了「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2000年11月9日，項目組發表了《夏商周年表》，認為夏商周始年是公元前2070年。但是關於這一說法，國內外學界存在不少爭議。

夏朝真的存在嗎？隨着考古工作不斷深入，我們總有一天會找到答案。

商周天下：中國與四方

商朝是中國古代的一個重要的朝代，在夏朝並無確切考古和文字證據的情況下，目前許多國內外學者把商朝看作中國最早的朝代，並認為中華文明從商朝開始，逐漸進入了統一國家的門檻。從時間上看，二里頭文化的後期可能已經進入了商朝的時代，兩者有所承接。

由於時間過於久遠，考古證據不足，圍繞商朝這一古代文明，存在許多未解之謎，其中一個有趣的謎團就是：商朝的地盤有多大？

湖北黃陂盤龍城緊鄰長江，1974年，考古學家在這裡發現了一個規模很大的商朝遺址。這是一座典型的商朝城市，裡面有城邑宮室、奢侈墓葬、手工業遺址等，發掘出來的各種銅器、陶器的風格，與考古學家在鄭州附近的商朝都城遺址裡的所見相同。

從湖北黃陂到商朝的核心地帶即今河南黃河流域，可謂相距千里，如果這裡的商朝遺址也在商朝的版圖內，那麼商朝的疆域之廣真是太驚人了，光是從都城向南就擴展了至少千里^①，更不用說還有北面、西面和東面的疆土了。從這座長江邊的商朝城市判斷，商朝的疆域似乎很廣大。

① 里，舊制長度單位，現在1里約合500米。——編者注

然而根據周朝初年的文獻記載，周武王伐紂滅亡了商朝之後，在原來商朝的王畿區設立「三監」管理，即把商紂王的兒子武庚分封在商朝都城，並將商的王畿區劃分為衛、鄘、邶3個封區，分別由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統治，總稱三監，以監視武庚的一舉一動。這三監的具體地域範圍，大概在今河北中南部、今河南大部，以及今山東局部地區。這個範圍就是商朝晚期商王直轄的控制區域了，也就是方圓一二百公里的一片面積不大的區域。由此看來，商朝的疆域似乎又很小。

那麼，商朝的地盤到底有多大呢？

有考古學家指出，商朝的王畿區和整個疆域並不是一個概念。根據商朝甲骨文記載，商朝把國土分為「內服」和「外服」，內服就是王畿區，即商王自己直接控制的地區，而外服則是周邊臣服於商朝的一些方國。有些學者認為，如果把這些方國也算入商朝的疆域裡，那麼商朝疆域的確十分廣大。

不過從甲骨文記載分析，我們真不能高估了商朝外服的地盤，因為商朝周邊那些方國，基本上都沒拿商朝當「天朝上國」，它們屢屢與商朝兵戎相見。

就拿商王武丁來說，他在位59年，以武功最為顯著，按說那時候商朝不弱了。可是就在武丁的時期，商朝的西北，即今山西一帶，居住着幾個強大的部落，比如工方、土

方和鬼方這幾個方國，它們與商朝經常發生激烈的衝突。

在一片甲骨上，記載了這樣的事情（大意如此）：有一天，壞消息從西方傳來，工方侵入我方領土，掠走 75 人。另一天，占卜師問，未來 10 天還平安嗎？商王看了卜骨上的裂紋後說，有麻煩，可能會有不幸的事發生。過了幾天，果然有壞消息了，土方又攻入我方西部領土，佔了我方兩個邑。

這些事情就發生在武丁時期，而且在不到一個月內邊境頻頻告急。

為了平定西北方向的威脅，武丁動員了 5 000 名將士，首先選擇對土方用兵，還與自己的妻子婦好一起出征，終於擒獲土方首領，並使其餘部遠遁。平定土方的威脅後，武丁轉而進攻勢力更大的工方。這個部落似乎是遊牧民族，向來出沒無常，很難尋覓。為了達到打擊工方的目的，武丁幾乎每次戰役都親自出征。甲骨文中記載，武丁曾多次向祖先占卜詢問，究竟應該徵集 5 000 人還是 3 000 人進行討伐。

商朝最大的一次徵兵數額記載，是商王帶兵萬人，加上婦好的 3 000 名將士一起出戰。這樣的軍隊規模，已經佔了當時商朝總人口的 1/10，幾乎可以算是舉國作戰了。

商朝其他方向上也都是不好惹的主兒。為了穩定國家，武丁曾經大舉討伐南方的荊楚和更靠西北方向的鬼方；婦好帶領軍隊參加過對羌方、土方、巴方和夷的一系列戰爭。商朝的武裝力量主要是宗族武裝，兵員來自各宗族，平時從事

生產勞動，戰爭的時候跟隨本族首領，在商王的帶領下出征。

總的看來，四周這些方國都和商朝是敵對關係，肯定不屬於商朝疆域。商朝就算有某些方國「小跟班」，其實力和疆域應該也十分有限。

商朝地處中原地區，從好的方面說是身處四通八達的交通要道，但是從壞的方面說，四面受敵，屬於典型的四戰之地，國際生存環境太惡劣。商朝的滅亡也歸咎於這種糟糕的國際環境。

商朝晚期，威脅主要來自西方和東方。在西方，周人的勢力崛起，拉攏各個方國準備向商朝的地盤發展；在東方，夷人勢力大增，頻頻入侵。夷人並不是一個統一的方國，而是分成了許多國家，包括夷方、林方、孟方等，分佈在今山東、今安徽等地。早在商朝中期，幾任商王就曾經興兵伐夷。

而到了商朝晚期，商紂王的父親帝乙在位時，夷人的威脅讓帝乙不得不親自東征。這次出征在甲骨文中大量記載，商王帶領大軍，聯合了諸侯攸侯喜的軍隊，用了130多天對夷方和林方作戰，然後又花費了同樣的時間返回都城。但是顯然這次大規模會戰並沒有解決夷人對商朝的威脅。直到商朝末年，商紂王仍然不得不繼續派出重兵，向東南方向的夷人進攻。

公元前1046年，西面的周人趁商朝的大軍在東南被夷人牽制，王畿空虛之際，揮兵東進，直逼商都朝歌。商紂王

倉促應戰，與周人的大軍戰於牧野。留守商軍終因兵力懸殊而被擊潰，商紂王敗亡後收拾美玉金帛，和嬌妻相擁自焚而死。馳騁中原幾百年的商朝就此終結。

商朝的滅亡告訴我們，自始至終商朝都處於強敵圍繞的尷尬局面，商王控制的區域不會比王畿區大多少。其實商朝人自己也很謙虛，用甲骨文記載戰爭時，稱呼自己為「商方」，意思是本國與其他方國都是平起平坐的，強不到哪裡去。

既然商朝的疆域十分有限，那麼我們怎麼解釋長江邊上出現的商朝城市盤龍城呢？盤龍城顯然是商朝的貴族率領一批人馬建造並長期經營的，這個遠離商朝疆域範圍的孤城肯定負有特殊的使命。

商王們雖然也希望擴大疆土，但畢竟國力有限，把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都融合在自己的版圖內，恐怕商王做夢也沒這個奢望。他們的現實追求是疆域之內的安定和周邊「國際環境」的和睦。有沒有事半功倍的方法呢？

正如二里頭文化藉助文化輸出來擴大自身影響力那樣，商朝歷代君王一定也明白文化輸出的重要性。

文化輸出就要拿出獨特的「文化創意產品」。考古學家經常說，沒有青銅就不成商朝。

商朝鑄造了大量的青銅器，其中包括重達 800 多千克的后母戊鼎。商王武丁的妻子婦好的墓中，青銅器共有 468

件，其中青銅禮器就有 200 餘件。我們後人看到婦好墓的隨葬品，覺得大量的青銅器讓人目不暇接。那麼真正的商王的大墓中，青銅器隨葬品該有多麼輝煌？雖然現在的歷代商王大墓早就被盜，空空如也，但我們可以猜想，歷代商王在下葬的時候，青銅器隨葬品比起他們妻子的隨葬品要檔次更高，也更加豐富。

要鑄造青銅器，就需要有高質量、大批量的銅礦。商朝疆域內的銅礦遠遠不能滿足鑄造青銅器的需要，於是任何有銅礦的地方，就成為商朝人垂涎之處。而長江中游地區，正是銅礦富集的區域，為了獲得那裡的銅礦，商王必然不惜一切代價。

所以一些考古學家推測，黃陂的商朝城池應該就是商朝為了控制長江中游的銅礦而建立的。通過這座千里之外的城市，商朝人可以獲取珍貴的銅礦資源，當然也可以順便收穫長江流域的一些其他資源。

可以想見，商朝人為了控制銅礦和其他資源而建造的孤城不會只有一座。所以除了王畿區外，商朝在廣袤的大地上也建設了一些據點，它們大多是為了獲取資源而興建。因此，商朝所謂的「疆域」並不是我們現在理解的國家疆域，商朝的疆域不是一個整塊，而是以都城為中心，控制了一小塊王畿區，然後四周遠近分佈着幾個或幾十個歸屬於商朝的諸侯據點。這些據點間的空隙地帶並不一定聽命於商朝，

有可能是人煙稀少的「無主之地」，或者控制在與商朝敵對的方國手中。

疏而有漏，這才是商朝疆域的真實情況，這才是商朝的「天下」。

青銅器對於商朝人的國內穩定和國際關係都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從國內來說，商朝人祭祀祖先時用來存放和奉獻肉類、穀物和酒等祭品的禮器都是青銅製的。沒有青銅，祭祀典禮就沒法進行，商朝人的社會生活也就亂了套。所以商朝貴族們都將祭祀時最常用而又特別重要、特別寶貴的青銅器，視為聖物世代保存。在這種情況下，青銅製造的「鍋碗瓢盆」就不僅僅是宮廷中的奢侈品、點綴品，而是政治權力的必需品。沒有青銅器，商朝就不成國家，商王也就無法治理本國。

面對周圍的方國，青銅器是商朝「國際外交」的重要文化輸出物品。由於青銅器製造技術掌握在商朝人手中，屬於一種壟斷高科技，通過賜予或者不賜予青銅器，可反映商朝與其他方國之間的親疏遠近，友好或敵對：「想要青銅器嗎？那就和我們站在同一陣營吧！」

比如，考古學家在今山東濟南的老城區附近發現了商朝的墓葬群，出土了一些青銅圓鼎、方鼎，有些青銅器上還帶有族徽和銘文。這說明商朝時期濟南地區的「據點」與河南安陽商朝「本部」有着密切的關係，商朝很可能是通過拉

攏這裡的部落，來達到控制遙遠的東方大片區域的目的。

商朝不論是疆域還是文化影響力，都要比二里頭文化大，甚至在長江流域都建有飛地，但實事求是地說，商朝並沒有讓廣闊區域的族群都認同它的權勢和文化。因此，說商朝建立起了真正的朝代，總是感覺很勉強，它只能算是一個正在邁向朝代級別的地區性政權。

中華文明中「天下」概念的初次形成和傳播，是周朝時候的事情了。

周朝吞併了商朝的疆土後，把陝西、河南、山西這些遠古文明區域整合起來，再通過向四周擴張、建立軍事據點的方式，實現了疆土的擴大，以及更大範圍的間接統治，同時繼續發展和傳播禮制文化，在廣闊的區域內建立起了思想文化上的統一。

而且，周朝繼承了商朝的文字，通過把青銅器贈予各諸侯國乃至周邊的政權，使漢字文化圈擴大開來，諸侯至少在名義上接受了周王為天下的共主。所以周朝不僅用軍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疆土的擴大，也繼承了二里頭文化乃至商朝的禮制衣鉢，用文化力量實現了廣闊區域的思想意識上的統一。

為鞏固自身的統治，在推翻商朝統治之後，周朝君主還派遣王室成員及其親密盟友到各處戰略要地，建立軍事移民據點。最早，這些軍事據點的絕大部分都分佈在黃河中

下游沿岸及太行山脈兩側，後來又擴散到其他地區的戰略要衝。這些軍事據點的首領被周朝王室授予了不同等級的爵位，爵位及其特權是可以世襲的。慢慢地，許多軍事據點逐步擴展成為城邑——國家的形式，也就是所謂的諸侯國。

為了對諸侯國進行控制，周朝的創建者們創立了一套宗法制度。

其中，嫡長子及其一系的後裔稱為「大宗」，庶子及其一系的後裔稱為「小宗」，因此，所有諸侯均屬於周王室的「小宗」。周朝形成了所謂的分封制的國家結構，天子在金字塔的最頂端，下面分封了一些服從天子的諸侯，在諸侯的下面是由諸侯分封的卿大夫，在卿大夫的下面是士。

在宗法制度、分封制度的基礎之上，周朝還制定了一套複雜的禮儀體系，規範王公貴族在不同社會場合的舉止行動。

到了西周時代，鼎作為等級的標誌，出現了列鼎制度。所謂列鼎，是一套形制相同、大小依次遞減、數量成單數排列的鼎。據記載，天子用九鼎，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則用三鼎。祭祀時這些銅鼎中都盛放各種肉食。與鼎相配的是盛放飯食的青銅簋，它使用的是偶數組合，也有多少之別。據記載，天子用八簋，諸侯用六簋，卿大夫用四簋，士用二簋。

古書《周禮》將周朝的政治結構描繪成一個以周朝王室

為中心的整齊劃一的體系，在這種政治模式下，國與國之間緊密相連，井然有序。後世包括孔子在內的大量古代學者都讚美周朝建立的這種禮制社會，認為這是最理想的天下治理模式。

但是，「理想」不等於現實。

回到周朝的前期看一看，與商朝類似，廣袤的大地上人口並不多，各個諸侯國的據點之間距離相當遠。從管理上說，周朝的前期只是一個十分鬆散的大聯盟，大家雖然依靠青銅器和禮制聯繫在了一起，但是周王室對於各個諸侯國的控制力仍然是十分微弱的。

不管怎樣，周朝畢竟建立起了一個廣大區域的鬆散政治模式，讓大量諸侯國名義上團結在了周王室的周圍，在思想上融合在一起。因此，如果說商朝只能算是一種朝代的半成品，那麼周朝就是名副其實的朝代。即使到了後來的春秋時期，天下大亂，「春秋無義戰」，但大小諸侯國名義上還都尊奉周天子為天下共主，給周王一個面子；戰國時期，七雄爭鋒，大國之間或合縱或連橫，但許多諸侯國都有與周朝近似的天下觀念，認為發動戰爭的目的是實現自己心目中的天下統一。

那麼，商周時期的人們到底是怎麼看待「天下」這個概念的呢？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

《詩經》裡的名言，似乎在當時人的心目中，「天下」就是天空之下的所有大地。其實，這是後人對於商周時期的「天下」的一種誤解，拿後來的認識替代了早期的認識。

在商周人心目中，「天下」是用來區分自己和外界的概念，是區分內與外、「中國」與「四方」的概念。這裡所謂的「中國」，在商朝的時候差不多也就是今河南、今山東一帶，在周朝前期也沒有擴張太多，在「中國」的外部，還有不屬於自己的「四方」或「四裔」。在商周人看來，「中國」就是「天下」，範圍並不大。

只是到了後來，周朝不斷擴張自己的勢力，他們的「天下」才逐漸向外擴展開來，一些原本屬於「四夷」的地方逐漸進入了「天下」的範圍，而這些「四夷」之外的更遙遠的區域，變成了新的「四夷」。

周朝「天下」的擴大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周王室既要有軟實力的青銅器，也要有硬實力的軍事強權，才能將自己的理想傳播到遠方。在周朝建立後的很長時間，有一個勢力始終不服，並且讓周朝吃盡了苦頭，這就是活躍在漢水和長江流域的楚國。

楚國早期的歷史晦澀難解，大致上人們認為楚國先民不斷南遷，最終發展為一個南方大國。楚國君主的一塊心病是，在周朝的政治體系中，他們只是子爵，封號太低了，與楚國的強大國力並不相稱。第六代楚君熊渠擴張到漢水

中游後，說了一句話：「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

從這句話中人們可以看出，當時周朝的「天下」確實是不包括四方蠻夷的。而熊渠說出這句話，就是表明楚國不願繼續存在於周朝的「天下」體系中了，以後可以自行其是，不需要看周王的臉色。

其實楚國早在西周初期就與滅掉了商的周朝有分庭抗禮的態勢。第四位周王即周昭王多次親率大軍征討楚國，其中大約公元前 982 年伐楚時，周朝最為精銳的西六師竟然被楚軍全部殲滅。周昭王後來在第三次率軍伐楚時再次失利，史書記載他「南巡不返」，其實就是暗示周昭王戰敗身死，據說他是在敗逃中淹死在漢水了。

周楚征戰給兩邊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對周來說，征戰導致元氣大傷，從此之後周朝的武力擴張基本上停止了，只能依靠禮制及青銅器「溫柔地」管理各諸侯國，再無凌駕於諸侯國之上的強大軍力了。

楚國的桀驁不馴，代表了商周沿襲而來的「天下觀」在傳播過程中有着頗多阻力。沒有「以力服人」的實力，就沒有「以禮服人」的底氣。客觀地看，至少在周朝的前期，還沒有哪個政權有實力兼併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兩大文明圈。

對楚國來說，從此自信心爆棚，逐漸不把周王室的權威放在眼裡，甚至有了平起平坐的態度了。楚國強大起來後，乾脆一腳踢開周王，在春秋前期的楚武王時代就自稱為王，

後記

春草秋禾織天下

2016 年 7 月 17 日，午後的陽光中，伴着蛙鳴和蜓飛，我走入了內蒙古正藍旗元上都遺址。

我知道，許多學者都有從幾百千米之外的元大都（北京）前往元上都遺址的經歷，甚至有學者執意徒步走完這段從華夏至草原的旅程。

親歷實地所獲得的感知，是閱讀多少本書都無法替代的。當我開始 7 月的這次漠南草原之旅時，本書的寫作已經啟動。所以我對這次珍貴的旅程非常期待，希望能夠給自己帶來更多的文明啟示。

元上都的恢弘氣勢令人震撼，眺望目光所及的山頭，上面似乎有類似敖包的建築，但實際上，那是當年元上都的烽火台殘跡。元上都作為都城，至少包含了三道城牆，從內到外依次是宮城、皇城、外城，再向外還有關廂。時至今日，考古學家依然可以從遺址中識別出城牆、城門、道路、護城河、防洪渠、宮殿、寺廟、店鋪、民居、倉庫等建築基座。

從結構上看，元上都與元大都非常相似。據說元大都和元上都就連城池的中軸線都是重合的，兩都相距幾十萬米，兩條中軸線僅有幾百米的誤差，古人利用簡陋的儀器創造了大地測量上的一個奇跡。

這並不奇怪，兩座都城的設計者都是劉秉忠、郭守敬等人，忽必烈的身邊人才濟濟，英雄不問出處。元上都是東亞的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相結合的典範，顯示了草的世界與禾的世界的深度交融。

站在今天的元上都遺址內，遊客依然能夠感受到這座城市曾經的輝煌。外城、內城和皇城的殘留城垣，向人們講述了一座草原上的帝都的繁華舊夢，世界各國的使臣、商人，以及如馬可·波羅一樣的來自遠方的旅行家們，都曾經在元上都的街道走過。在那個時代，元上都和元大都是當時歐亞大陸上的夢幻都市，當之無愧的全世界之中心。

這樣的古代文明高度，是如何從茹毛飲血的遠古一點點積累起來的？

回到中華文明的原點，我們看到4000多年前滿天星斗的文化，散落在廣闊的中華大地上。從考古學證據看，平原、草原、高原、森林、綠洲都有人類活動的身影，也都留下了或多或少的文化遺跡。當滿天星斗轉向月明星稀，二里頭文化以及之後的商周文化輻射到了廣闊的區域，一些專家甚至認為，二里頭文化就是「最早的中國」。

但是，我們要警惕考古和文獻帶來的「偏差」。在某些區域沒有發現大型的考古遺跡或重要遺物，並不代表那裡當年沒有繁榮的文明。古代人不能在缺乏石頭的原野上建造起石頭城池，比如黃土高原的早期文化就無法建造出埃及金字塔；也不能在缺少銅礦的地區發展出青銅文明，比如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可能無法製作青銅器，因為缺乏銅礦。

商周時期華夏文字形成並發展，記載日益增多，而周邊卻處於無文字的時代。於是，後世的我們可以獲得大量關於商周文明的史料，卻在面對周邊文明的時候，兩眼一抹黑。

沒有文字記載，就沒有繁榮的文明嗎？未必。至少我們知道，商周早期的青銅技術肯定是從外面輸入的，西亞先進的青銅技術很可能通過西域河西走廊或者通過「草原之路」傳到中原地區。既然「無青銅，不商朝」，那麼比商朝掌握青銅技術更早的西域文明或者草原文明，也必然是不遜色於中原的，只要我們不對它們吹毛求疵。

如果二里頭是最早的中國，那麼擁有先進的青銅技術，以及可能還有馬車技術的草原文明是甚麼？如果它們不是最早的中國，它們又是甚麼？

即使在所謂最早的中國的時候，各個區域文明也都是各擅勝場的，都是相互交流的，它們都屬於最早的中國。草的世界與禾的世界同樣精彩，這就是中華文明原點位置的文明圖景。

漢朝與匈奴的白登山之戰，揭開了一場延續兩千年的史詩般的文明大片，草原文明與華夏文明作為對等的兩方，平起平坐，時戰時和。兩千年間，草原文明和華夏文明都因為對方的存在而不斷調整自己，協同演進。

在這場大片的第一個千年中，經常上演的劇情是，草原上的某個或某幾個族群入主華夏，在成為華夏的一方勢力、攜帶了華夏基因的同時，卻丟失了自己體內的草原文明基因，比如融入華夏的南匈奴。草原族群如同溪流一般，一股股地流入中原，攪亂華夏文明「池塘」的同時，卻把廣闊的草原讓給了其他草原族群。

這樣的場景屢屢上演，與其說是草原文明被華夏文明的輝煌燦爛感召而來，被「漢化」為正統，還不如說那個時候，不論是草原上的遊牧族群，還是平原上的農耕族群，都還沒有整合不同文明的足夠經驗，沒有操控跨文明政權的知識和人才儲備。於是，擺在面前的是一道單選題，要麼建立並完善一個單一華夏政權，要麼建立並完善一個單一草原政權。

鮮卑選擇了後者，北魏從盛樂、平城出發，走進了洛陽城，改變了自己，也一定程度地影響了華夏文明。而草原上也是「城頭變幻大王旗」，匈奴—鮮卑—柔然—突厥，一路走過來，它們滿足於遙控華夏王朝，讓其成為向自己提供華夏物產的進貢國，並沒有徹底征服華夏王朝，將其土地納入版圖的強烈意願。

隋唐在安史之亂前，特別是當突厥內亂之時，也曾主動

出擊，短期內控制了廣大的草原乃至西域，形成了以華夏為主體的混合政權模式。但盛況只是曇花一現，安史之亂不僅讓唐朝迅速萎縮為一個典型的華夏王朝，甚至一度要臣服於在突厥身後崛起的回鶻，而回鶻與突厥類似，對把華夏土地納入版圖不感興趣。

當兩千年的大片進入第二個千年時，瓜熟蒂落，已經熟悉彼此的兩大文明終於不再謹慎與客氣。9世紀，耶律阿保機的契丹從草原起步，踏上了新的文明融合之路。草原文明鬆散的部落聯合體逐漸被打破部落隔閡的統一的軍政體系取代，輪流坐莊的首領遴選制度被世襲王權替代，契丹的疆域內還出現了大片的農田和眾多的城鎮，契丹人真正啟動了以草原為主體的混合政權模式的探索與建設。

文明整合的歷史進程當然沒那麼簡單，契丹付出了皇帝南征而死的巨大代價。但文明融合的按鈕一旦被按下，就如同核彈頭爆炸一樣不可逆轉。

女真人與蒙古人前仆後繼，終於實現了對草的世界和禾的世界的第一次大融合。這不僅僅是軍事征服，還是政治、經濟、文化的整合，也是思維觀念上的整合與創新，元朝甚至以自己的新天下觀更新了商周以來的舊天下觀。統一政權模式開啟並進行了第一次試驗，雖然最後以元朝的碎片化結束。

反觀華夏，在巨大的北方軍事威脅下，華夏文明也在調整，增強自身，輾轉騰挪。它們不斷地消化疆域內的山地族

群，它們開挖漫長的運河來運輸糧食和士兵，它們還面向海洋擁抱海外貿易財富。

此後，崛起於東北地區的清朝繼承了元朝締造的新天下觀，實現了「臨門一腳」，彌合了碎片化的長期割據勢力，再現統一政權模式，並在越來越強勁的全球化的影響下，完成了向統一國家的轉變與建設。

而中華文明又是整個世界的人類文明的一部分，在明清時期，近代全球化帶來了越來越頻繁的交流與互動，中華文明在完成內部區域文明整合的同時，也被世界整合，融入了全球化的洪流之中，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接受還是抵觸，中華文明融入了更高層次的「天下」。

這兩千年，是中華文明中的各種區域文明彼此靠近，走向整合的兩千年，主劇情是草原文明與華夏文明的對角戲。從單一華夏政權與單一草原政權模式演進到以華夏為主體的混合政權與以草原為主體的混合政權模式，再演進到元朝統一政權與清朝統一政權模式，這便是中華文明融合史的主旋律，雖然偶有反覆，但趨勢不變。

回顧這段漫長的文明融合歷史，尤其是用多視角的方式來看待草的世界與禾的世界，我們會更接近歷史的真相。

曾經有一種觀點是，華夏文明是輝煌的燈塔，周邊族群仰慕華夏之文明以及華夏之財富（財富可能比文明更有吸引力），它們紛紛融入華夏文明之中，如同落入漩渦般被捲入華

夏體系，華夏文明不斷擴大自己的影響力，最終形成了大一統的中華文明。或者客氣一點說，華夏自周朝建立起的天下體系具有強大的文明融合優勢，把周圍的「四夷」都納入了這個體系之中。

另一種相反的觀點是，華夏農耕文明是封閉保守、沒有創新和前途的。正是草原游牧文明孕育的一代代族群衝破長城，入主華夏，它們給暮氣沉沉的華夏文明不斷注入激昂的進取基因，推動了中華文明走向古代文明的高峰。或者委婉一點說，內亞（亞洲內陸）是華夏危險的邊疆，內亞力量不斷侵入，推動了大一統的中華文明的形成。

這兩種文明觀，都犯了相同的錯誤——以單一視角解讀歷史。兩種文明觀對於文明的理解是絕對的，認為某一種區域文明是高等的，另一種區域文明是低等的，最終高等的文明要消滅或合併低等的文明。

當草原文明遭遇華夏文明時，兩者並無高低之分，它們是形成於完全不同的自然環境和歷史環境的區域文明，單一草原政權模式和單一華夏政權模式有着自己獨特的治理方式、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傳統。正如一碗牛奶與一碗米粥無所謂高低之分，草的世界與禾的世界以不同的方式，滋養了不同的族群民眾，其文明無分高下。

草原的進取性和華夏的保守性，是自身文明系統運轉的結果，首先是草原和華夏為了解決自己內部的問題而選取的外交策略。草原帝國需要用財富特別是農耕區的財富來維持

鬆散的游牧體系的穩定，華夏王朝需要用嚴格的管理制度讓農民安居樂業，維持王朝的穩定。

與人們的一般想法不同的是，不論是單一華夏政權模式，還是單一草原政權模式，其實都不熱衷於侵佔對方的土地。即使是一個四處出擊的草原帝國，也更希望華夏這隻「會下金蛋的鵝」能夠保持安穩，給自己帶來源源不斷的物產貢品，從而給草原帝國帶來長治久安。破碎的華夏王朝不僅是華夏的大麻煩，而且是草原的大麻煩，華夏與草原都得鼓起勇氣解決自身的麻煩。反之亦然。

當文明的融合日益深入，某些政權陰差陽錯地擁有了跨越區域文明的疆域，變成了混合政權時，這絕不只是帶來了帝國／王朝的榮光，也帶來了嚴峻的政權轉型難題和文明融合難題。不論是以華夏為主體的混合政權模式還是以草原為主體的混合政權模式，探索的道路上倒下了一代代雄主。

所以，文明的融合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漫長的、動態的歷史過程。融合之路步步遞進，也反反覆覆。推動文明融合的幕後力量，並不能簡單地歸因於一方，而是十分複雜的。華夏自身在不斷演進，草原自身也在不斷演進。同時，對於文明融合來說更重要的是，華夏與草原面對彼此時，也在不斷調適自己的戰略。

曾有觀點認為，華夏王朝修築長城的行為強烈地影響了草原，促使草原上的部落競爭更為激烈，最終形成了諸如匈奴帝國這樣的草原強權。這個觀點的可取之處在於，它認識

到了草原與華夏是互動的，一方的決策會給另一方帶來變化。

當然了，這個觀點仍然有華夏中心論的基調。其實早在長城修築之前，草原各方勢力就已經踏上了整合之路，正如當時的華夏也處於整合之中，兩者在走向單一政權模式的過程中，對方的影響並不大。長城的出現是草原影響力增強的結果而非原因，不是長城的出現強烈影響了草原。長城只是一個防禦性工事。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政權模式向前一步，終於抵達統一政權模式。統一天下的重任最終由草原背景的族群而非華夏背景的族群來完成，這是因為統一首先要以疆土的統一為基礎，草原強大的軍事力量是華夏王朝所不具備的、難以抵擋的。當然疆土的統一只是淺層次的統一，甚至在統一之前，經由漫長的混合政權模式的歷練，草原背景的族群就已經對不同區域文明的政權組織、生產方式、文化傳統有了充分的認知和融合嘗試，這是元朝能夠實現統一政權的歷史背景。

有觀點認為，東北地區是中華文明大融合的濫觴之地，這裡有農耕、漁獵和遊牧各種生產方式，因此從東北地區走出的政權才具有統一天下的能力，金朝和清朝都是證明，而元朝是一個意外的案例。這個觀點認識到了混合政權模式對於文明融合的重要價值，金朝和清朝在起家之初就是混合政權，因此它們在吞併其他區域文明後可以很快實現有效治理。

但金朝僅僅佔據了華夏的半壁江山，為了有效統治華夏

甚至不得不戰略性地放棄東北地區；清朝則是在兼併了蒙古各部，即整合了草的世界後，才終於有了和明朝爭雄天下的實力，不論是當時的清朝還是蒙古各部，都繼承了成吉思汗對於草的世界的改革成果。反過來看，契丹和蒙古帝國都曾經從草原出發，兼併整合了東北地區。因此，東北地區的確是容易催生混合政權的區域，但也僅限於此，草的世界的任何區域，都有可能孕育出邁向混合政權甚至統一政權模式的勢力，東北地區並不具有絕對的優勢。

以上就是關於中華文明數千年融合史的一些總結性淺見，從草是草、禾是禾，到禾中有草、草中有禾，再織就天下一色的錦繡河山。那麼，這種趨勢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中華文明的大一統是一個必然結果嗎？

《三國演義》寫道，「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是對歷史的偶然性的一種描述，這種觀點認為大一統只是一種偶然。古希臘名言說，「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又暗示了一種不可逆轉的必然趨勢。

如果我們把中國歷史切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後的時間節點，那時大航海時代還沒有開啟，美洲農作物、白銀以及歐洲的火器還沒有傳輸到東亞，元朝已經建立起了有效的統一政權模式，所以有學者認為，第一次全球化時代應該是蒙古帝國以及元朝的時代。而在這個統一政權模式之前，中華文明的融合有着強烈的遞進關係，從草原、華夏各自群星閃耀的遠古文化，到整合為單一政權，再演進到混合政權，最後

形成統一政權，即使偶有反覆，但大趨勢幾乎可以認為是必然的結果。

讓歷史展現出這種大趨勢的原因是複雜的，在於人口的增多帶來的頻繁交往，在於各族群知識的積累和相互的文化交流，在於不同區域文明之間日益強烈的經濟聯繫……歷史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一種重要物產、一種新的發明、一種新的模式的出現，根本性地改變了歷史。因此，草的世界與禾的世界融合為大一統，時機成熟的時候總會發生的，而歷史也用元朝的實例告訴我們，大一統的確是一種必然。

但是，當我們把中國歷史切到朱棣死後的時間節點，元朝建立的統一政權變成了碎片，似乎又印證了合久必分的論調，大一統並不會江山永固，恰恰相反，囊括草的世界與禾的世界的大一統充滿了不穩定性，有時候統一政權模式的不穩定性還要大於單一政權模式和混合政權模式。不穩定性並不代表大一統是糟糕的，只是對政權治理難度的要求提高了。而古代科技的不斷積累，比如大運河等水利設施的完善，以及各個族群的相互學習，比如文官制度的充分運用，這些都讓廣闊疆土的治理難度逐漸降低，這也是歷史的必然趨勢。

更為關鍵的變革來自外部世界的衝擊，明清時期近代全球化浪潮席捲而來，東亞地區也無法獨善其身，草的世界與禾的世界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劇變，在一定程度上其實降低了大一統政權的形成與治理難度，於是清朝的統一政權模式

比元朝更勝一籌，更為長治久安。

話說回來，外部衝擊固然有偶然性的一面，但即使沒有外部的衝擊，中華文明的大一統依然有很大的概率再現。

只是，夏日金色陽光中的元上都已變成了壯闊的遺址。曾經於此，華夏文明的城池與草原文明的氈房比鄰而居，雕龍角柱和銅金剛鈴同在一座屋檐下；面貌迥異的各方商人熙來攘往，絡繹不絕；肩負使命的各族群官員領命覆命，為了同一個大汗或皇帝服務……那是一幅中華文明融合的生動畫面。元上都屬於中華文明，它南面的夥伴元大都也一樣，那個城市不論是叫汗八里還是叫北京城，都繼承和創造着中華文明的表裡山河。

草原上金蓮花怒放，被紅巾軍付之一炬的元上都遺址裡，塵封了數千年的文明融合往事，那些往事塑造了中華文明的前世今生。荒煙蔓草千百年，當今世界和我們自己，都是文明融合的產物。

我剛剛踏上的這塊舊石磚，說不定也曾被馬可·波羅踏過。